

探究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 ——基于超语视角

贾庆武, 刘璇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6日

摘要

随着人们掌握第二种甚至多种语言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多语语言习得已成为外语教学的焦点。然而, 目前国内对少数民族二语习得或多语习得的研究仍较为匮乏, 尤其是在大学教育背景下的实证研究。尽管汉语和英语占主导地位, 但少数民族的母语无疑是其语言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者之间的互动值得探讨。本文以X大学的少数民族本科生为例, 采用定性研究的研究方法及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式, 将探索少数民族的多语观念。本研究立足于实际的多语习得实践, 旨在调查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 以期对语言教学提供一些启示。研究发现, 学生总体对多语持有积极观念, 但与此同时也表达了对多语学习的担忧与存在的挑战, 其中家庭教养和学习环境作为主要的形成影响因素, 并影响着语言使用者在不同交际环境中的语言选择与使用。这些发现为语言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语言习得, 多语习得, 超语

Exploring Multilingual Beliefs among Ethnic Minorit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 Translanguaging Perspective

Qingwu Jia, Xuan Li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August 14,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6, 2026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individuals to acquire a second or even multiple languages, the rapidly

文章引用: 贾庆武, 刘璇. 探究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457-465.

DOI: 10.12677/ml.2026.149944

developing field of mult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has become a focal area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 and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among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China remains relatively limited, particularly empirical studies conducted in higher education contexts. Although Mandarin Chinese and English occupy dominant positions,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native languages undoubtedly constitute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their linguistic repertoires,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languages deserve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aking ethnic minori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X University as a case,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employ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explore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beliefs about multilingualism. Grounded in actual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practic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ethnic minority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perceive multilingualism and to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educ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generally hold positive beliefs toward multilingualism; however, they also express concerns and challenges associated with multilingual learning. Family upbring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are identified as major factors shaping their multilingual beliefs, which further influence language users' choices and practices in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context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multilingual educ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Language Acquisition,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Translanguag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发展以及跨国与跨文化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掌握两种甚至更多语言,多语已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其研究尤其在教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多语能力并不是多个单语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语言使用者依据交际对象、任务和社会语境调动不同语言资源的综合能力。Cenoz 指出,多语应从语言使用者整体语言资源及其动态使用的角度加以理解[1]。Saville-Troike 也指出,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在世界许多地区是一种常见现象[2]。Cenoz 和 Gorter 进一步认为,个体的语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社会背景影响,尤其是在英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共存的多语言环境中[3]。例如,欧洲巴斯克地区长期存在巴斯克语、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共存的现象。类似的多语言环境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的多民族、多语言生态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景观。

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多样性促使了双语和多语教育实践的出现,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值得进一步研究。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进一步激发了对多语言的学术兴趣,特别是三种或更多语言的习得,包括普通话,英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使用多种语言的人经常在他们习得或学过的语言(如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进行语码转换或超语,以促进沟通和增进理解,这种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于是,双语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多语教育应运而生。

语言多样性既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景观,也给语言教育和政策带来机遇与挑战。相关研究关注了少数民族学习者在多语环境中的语言经历及其身份建构问题[4]。相较于基础教育,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少数民族双语或多语研究仍较少[5]。因此,有必要关注少数民族大学生如何在普通话主导的高校环境中形成多语观念,以促进语言包容和教育公平。

综上所述, 人类社会的全球融合和多元文化的共存, 以及中国国际化的推进和对多语人才的需求, 促进了少数民族双语和多语能力的发展。由于多语使用者拥有丰富的语言储备, 可以灵活使用语言, 因此认为少数民族人才资源的开发应充分利用这些多语优势。然而, 目前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多语信仰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 本文试图通过超语的视角来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对中国某高校学生进行多语观念的探究, 旨在为复杂语言环境下的语言教与学提供洞见。

2. 文献综述

2.1. 多语教育政策研究

多语言教育政策是当前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特别是在语言多样性普遍存在的移民国家。Dagenais 通过回顾多语言、政策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对加拿大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进行了概述, 并指出语言二元政策与现实多语需求之间存在张力[6]。与加拿大强调法英双语不同, 欧洲国家长期将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学习置于政策的重要位置[7]。相关政策鼓励学习者在母语之外发展多种语言能力, 体现出将语言多样性视为社会资源的取向。相比之下, 中国语言政策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Zhou 从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角度梳理了中国语言政策的发展, 指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多样性原则并行存在[8]。

2.2. 超语研究

超语最初用于描述双语课堂中学习者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灵活调动的教学实践, 后来逐渐扩展为理解双语者和多语者复杂、流动语言实践的重要概念[9]。前缀“trans-”强调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不仅能够使用多种语言, 还能够在学习和使用过程中协调多种语言、认知和符号资源。超语研究与双语和多语研究相结合, 近年来尤其关注其在双语和多语教育中的应用, 并为理解多语使用者的社会沟通与意义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10]。

相关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超语在双语和多语教育中的实际运用。在新疆一所大学中, Zhang 和 Chan 对两位英语教师的课堂超语实践进行了研究, 发现学生被鼓励在不同语言之间建立跨语言联系[11]。Lasagabaster 和 García 进一步指出, 超语能够使双语学习者综合调动已有语言与符号资源参与意义建构和知识学习[12]。这些研究表明, 超语理论为少数民族及多语学习者的语言教育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教育中的超语和语码转换彼此相关, 因为二者都涉及多种语言资源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使用, 但其认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语码转换通常强调语言使用者在不同“命名语言”之间的转换, 而超语更强调语言使用者对其整体语言资源库的灵活调动[9]。因此, 超语并不简单等同于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 而是关注多种语言、认知和符号资源如何协同参与意义建构; 与此同时, 超语实践也并非为了取代语码转换这一概念[10]。

2.3. 信念研究

一般认为, 信念构成个体理解语境并调整语言使用实践的重要认知系统, 其形成受到具体语境与个体经验等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13]。

关于语言的信念是指对一种特定语言的感知, 包括对其价值的理解和评价。它们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形成的, 是在特定的互动环境中习得的, 而不是遗传的。信念与个体对某种语言的态度密切相关, 在语言习得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说, 积极的信念往往会增强认知评价和情感评价, 增加学习者

学习语言的意愿, 最终支持相应语言能力的发展。

少数民族学生对多语教育存在不同看法。郭奕含对剑川县白族多语教育的研究关注了多语教育与当地语言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14]。高航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初中生语言状况的调查则考察了参与者对普通话、韩语和英语等不同语言的态度, 结果显示学习者对不同语言的情感与认知评价存在差异[15]。从实用主义和社会影响的角度看, 语言能力还会与学习、交际及未来发展机会相联系。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白

近年来, 由于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多语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随着对第二语言和多语言教育的关注, 以及对国内语言教学实践的关注, 探索出了适合中国语境的新命题, 这符合当前中国重视语言教学的大环境。尽管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 但对当前中国语境下多语教育相关的问题和挑战仍缺乏全面的认识。虽然目前关于语言习得的研究比较普遍, 但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和中国新疆、延边等少数民族地区, 很少涉及多语学习者, 尤其是高校少数民族多语学习者。此外,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研究上, 忽视了对多语习得发展的细微特征。对大学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大学生多语习得信念的实证语言学研究仍然缺乏, 需要为提高学生多语习得能力、提高语言教学效果提供反馈和有效对策。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崔雪波通过回顾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三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与教育模式的形成, 强调应进一步加强三语教育研究, 并为有效的多语言教育建立支持性的外部环境[16]。因此, 对中国少数民族多语学习者的信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有助于理解少数民族学习者多语习得与发展的特点, 也可多语教学提供实证依据。

与此同时, 近年来, 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使得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大学生数量显著增加。这些学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因为他们在以普通话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学术环境中生存。探索这些学生的多语言习得过程, 以及他们遇到的具体挑战和机遇, 对于理解来自不同语言环境的少数民族学习者的需求至关重要。

总之, 调查学生对使用多种语言的信念对于理解他们在进行多语言互动时表现出的元语言意识至关重要。因此, 本文拟从语言感知、影响因素、语言选择和使用三个维度来解决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 (1) 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多语使用持有怎样的信念?
- (2) 影响多语信仰形成的因素是什么?
- (3) 多语环境如何影响他们的语言选择和使用?

3.2. 研究对象

由于大学生在语言学习中正处于承前接后的时期, 其语言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衡量语言生命力的标尺, 其语言运用和语言态度是一门语言能否得以维持的关键。

这项研究是在中国西北的一所大学进行的。公开数据显示, 这所大学招收了大约 1000 名少数民族学生, 以回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为主。大多数学生都是典型的多语言学习者, 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涉及到多种语言的习得, 包括他们的母语、汉语和英语。

根据研究目的和问题, 本研究确定了三名不同民族的学生作为研究参与者, 分别代表维吾尔族、朝鲜族和回族。他们都精通常备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他们还长期从事英语学习, 并选择英语作为自己的

专业。因此，他们非常熟悉大学教育背景下的多语言习得实践。参与者的信息见表 1。此外，他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样化的环境中，经常使用多种语言，这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语言背景中提取来构建意义，激活先验知识，并采取各种灵活的策略来学习和使用目标语言。

Table 1.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表 1. 参与者信息

Number	Sex	Age	Grade	Nationality	Major
Student 1	male	23	undergraduate	Uyghur	English
Student 2	male	19	sophomore	Korean	English
Student 3	female	22	senior	Hui	English

3.3. 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在定性基础上构建，并利用访谈获得的数据来强化和深化知识，其中有 3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

定性研究具有较强的探索性，旨在从参与者赋予经验的意义出发理解和解释现象[17]。基于本研究对学生多语观念的关注，需要以文本数据为主要材料并进行解释性分析，因此访谈被选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方式。

半结构化访谈能够通过有目的的对话深入了解参与者的经验、观念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17]。本研究据此围绕多语观念、影响因素和实际语言使用展开访谈，同时保留根据参与者回答调整提问顺序和追问内容的灵活性。相关定性研究方法文献也指出，访谈有助于从参与者视角理解其经验与意义建构[18]。

3.4. 数据处理和分析

半结构化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一种数据收集手段，给予了访谈者和被访谈者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共同探讨研究的中心问题。

首先，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设计自编访谈提纲，作为开展深度访谈的指导框架。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可以调整提问的顺序和方式，不拘泥于顺序，而是适应每次采访的具体目标和流程。与此同时，受访者有机会塑造讨论的结构和方向，从而获得更丰富、更细致的数据。

访谈结束后，录音被转录和编码，生成大量文本数据供分析。这些数据侧重于参与者的感知、语言选择，以及不同语言中词汇、句法和形态结构的使用。此外，它还提供了影响多语言习得的潜在因素的见解，有助于理解参与者对语言学习的信念。

简而言之，本节主要包括面试大纲设计、面试过程和面试分析。此外，本研究在自然环境中进行，遵循自愿参与、隐私保护、匿名报告等民族原则，并对数据进行验证，以确保研究的可信度。

4. 发现与讨论

4.1.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

访谈结果显示，三名参与者总体上对多语持积极观念，并普遍将掌握和使用多种语言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个人资源。总体而言，根据定性数据，受中国教育背景的影响，学生们分享并表达了类似的多语制信念，大致认为多语制是有益和积极的，但也仍然具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对多语挑战的担忧也存在，且不容忽视，其中成长和学习环境的担忧占主导地位。

首先，由于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在参与者的多语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学生总体对多语和多

语教育持积极观念。这一发现支持了既有研究关于多语能力具有多重资源价值的结论。张贞爱关于朝汉双语人的研究指出, 朝鲜族学习者长期生活在朝鲜语与汉语共同使用的语言文化环境中[19]。在多语言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学生 2 分享说: “我认为多语言显然有很大的优势, 由于多语言教育, 我们少数民族可以更方便地与他人交流, 更好地了解他人, 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环境中更好地融入多元社会。”在语言习得和交流的经历中, 少数民族学生不同互动语境中能够在母语、汉语和英语之间进行较为灵活的选择。学生 3 也指出: “我相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学习多种语言绝对不会出错, 因为多语言能力不仅能提高一个人的竞争力, 还有助于促进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我来说, 掌握多种语言是在不久的将来增加自己发展机会的重要途径, 通过它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各地的人, 同时也可以继承和推广自己的文化。”由此可见, 参与者将多语能力视为重要的交际资源, 同时赋予其社会适应、文化传承与个人语言文化背景等价值。

其次, 本研究进一步呈现了积极多语观念内部的复杂性。部分参与者强调了在学习和社会环境中平衡多种语言的困难。学生 1 分享了其在大学阶段学习普通话时的焦虑与抗拒: “一开始, 我对标准汉语不熟悉, 需要弥补, 这导致了额外的学习压力, 让我经常感到焦虑, 情绪上的压力, 甚至是抗拒。”在正式学习环境中, 语言之间的语法和词汇差异以及对准确性和熟练程度的要求, 会增加学习者在不同语言之间转换的难度。Zhang 和 Chan 也指出, 少数民族学生获得不同语言学习与使用机会的程度可能并不均衡[11]。

因此, 本研究在既有结论基础上补充表明, 积极的多语观念与语言学习中的压力、焦虑和能力不均衡可以同时存在。对于本研究参与者而言, 多语观念并不是简单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而是学习者根据不同语言所具有的交际价值、发展价值、学习成本和身份意义形成的综合认识。这反映了我国教育发展的现实落后性和不平衡性, 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进行巨大改革势在必行。

4.2. 多语信仰形成的影响因素

在访谈中还讨论和探讨了影响学生多语信仰形成的各种可能因素, 这些因素是由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相交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形成的, 其中家庭教养和教育环境将在本节中具体说明和分析。

首先, 家庭教养被确定为一个基本影响因素, 参与者讲述了家庭支持在其语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王娟对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语言态度的研究发现, 家庭传承会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对母语的态度[20]。学生 1 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社区长大, 在家大部分时间使用维吾尔语。他分享说: “我的母语一直是讲故事、文化知识传递和社区联系的纽带, 从小就给我带来了深刻的自豪感和归属感。”由此可见, 母语在家庭教养和社区互动中承担着文化传递和维系联系的功能, 也使参与者形成了对语言多样性的积极认识。

此外, 教育环境也成为他们掌握多语言能力的关键决定因素。通过回顾参与者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 可以发现教学方法、语言政策和同伴互动共同塑造了学生的语言发展轨迹。此外, 由于大学是不同语言的大熔炉, 与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同学的互动也会影响学生的语言选择和使用, 即同伴交流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在以汉语为主导语言的学习和社会环境中, 有时我可能无法用汉语表达我的真正意思, 并且由于语言表达不善或发音不足而遭受语言歧视或偏见。因此, 有时我可能会抵制同龄人的交流。”学生 3 说: “虽然我从小就接受双语教育, 但有时我觉得我对学习英语没有兴趣和动力。它仍然太无聊了, 大多数老师仍然采用传统的、僵化的语法翻译教学方法, 据我所知, 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于, 家庭与学校并不是两个彼此孤立的影响因素, 而是在参与者长期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中共同塑造其对不同语言的功能认识。从访谈可以看到, 民族语言更多与家庭生活、文化记忆、族群成员交往和归属感联系; 普通话更多承担正式教育和跨民族交往功能; 英语则更多与专业学习、跨文化交流及未来发展机会联系。不同场域因此使参与者逐渐形成了关于“何种语言

具有何种价值、适合在何种空间使用”的认识。

4.3. 多语言环境下的语言选择和使用

超语理论认为,语言使用者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多种语言和符号资源视为一个整体的语言经验库,并在实际语言实践中根据交际需要进行灵活调动。李嵬和沈骑指出,超语概念中的“trans-”强调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协调多种语言、认知和符号资源的能力[10]。

Galante 指出,对话双方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是影响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21]。经过多年的多语言学习,学生 1 能够根据互动语境灵活使用母语、汉语和英语。他分享道:“在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术环境中,我主要使用中文来阅读课程材料,并与教授和同学互动。然而,在课堂外与其他维吾尔语同学的非正式对话和互动中,我自然倾向于使用我的母语,维吾尔语,因为它是一种强大的媒介,可以促进联系,保留民族特征,并表达特定于共同经历的微妙概念。因此,维吾尔语成为安慰和团结的来源,在多语言环境中加强了社区意识和归属感。”这表明,语言选择受到熟练程度、语用需求和互动对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当交际者来自不同语言背景时,共同语言往往成为互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基础。

4.4. 讨论

综合三个研究问题可以发现,本研究中的多语观念具有明显的语境性、动态性和关系性。三名参与者并不是简单地“支持”或“反对”多语,而是在不同经历中不断评估各种语言能够带来的机会、学习成本、文化意义和交际价值。这一结果既支持现有研究关于多语能力具有多重资源价值的基本判断,也进一步表明,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语言经历中,积极的多语观念可以与语言焦虑、能力不均衡和语言偏见同时存在。多语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优势;一种语言资源能否转化为实际的学习和社会资源,还取决于学习者能够获得怎样的教育支持以及不同语言在具体制度空间中的使用条件。与本研究相关的国内讨论还涉及语言关系[22]、超语实践视域下的外语教育规划[23]、应用语言学研究前沿[24]以及多语言意识下的外语教育规划[25],这些研究共同构成理解中国多语教育问题的重要研究背景。

基于这一发现,高校语言教育首先需要针对学生实际经历的学术普通话压力提供支持,而不是将语言差异简单解释为个体能力不足。学生 1 关于普通话学习压力以及参与者关于表达和发音偏见的叙述说明,对于具有不同民族语言背景的学生,可在大学阶段提供针对学术口头表达、课堂互动、学术写作和专业词汇的支持,并通过教师培训和校园语言多样性教育减少针对口音和表达方式的负面评价。这里的重点并非降低普通话学习要求,而是减少不同语言教育经历所造成的额外学习成本。

其次,针对参与者提出的英语学习动机不足和传统语法翻译教学问题,英语课程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学生已有的多语资源,而不是要求其在进入英语课堂后暂时“关闭”其他语言。可在比较语言表达、跨文化案例分析、术语理解和小组协作中允许学生策略性地调用普通话、民族语言和英语,再逐步转向英语产出。这种做法强调的是策略性超语,而非取消目标语学习,也与超语实践视域下强调多语资源整合的外语教育规划讨论相呼应[23]。

再次,参与者将民族语言与家庭联系、文化记忆和群体归属密切联系的发现表明,高校多语教育不应只关注普通话和英语能力,而应为民族语言保留适当的可见性和使用空间。例如,可通过民族语言文化社团、多语校园活动、口述历史或数字故事项目,使学生能够把民族语言用于真实的知识与文化生产,而不仅是在私人交往中使用。这一思路也与少数民族地区多语教育研究对语言文化资源与教育场域关系的关注相呼应[14]。

最后,由于本研究仅涉及三名不同民族背景的大学生,上述结果和教育启示应被理解为基于三个信息丰富个案形成的解释,而不能推广为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共同特征。本研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揭示一种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关系: 学生的多语观念、语言选择和语言情感可能由个人语言经历、家庭实践、教育环境以及不同语言的社会价值共同塑造。未来研究可扩大民族类别和参与者规模, 并结合课堂观察、语言使用日记或纵向访谈, 进一步考察学习者所报告的多语观念如何转化为实际语言实践, 以及高校正式教育空间是否为不同语言资源提供了同等程度的参与机会。

5. 总结

本研究以超语理论为视,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考察三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观念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多语言环境中的语言选择与使用。研究发现, 首先, 参与者总体上对多语持积极观念, 普遍认可多语能力在沟通交流、跨文化理解、学习发展和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价值。然而, 这种积极评价并不意味着多语学习过程不存在困难。部分参与者同时经历了语言能力差异、额外学习压力、语言焦虑以及表达方面的困难。这说明, 多语观念并非简单表现为“积极”或“消极”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 而可能同时包含对语言价值的认可和对实际学习困难的担忧。其次, 家庭语言实践与教育环境是影响参与者多语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家庭中的语言使用使民族语言与日常交流、文化知识传递和社区联系保持密切关系, 而学校教育、教学方式、同伴互动和社会网络则进一步塑造学生对普通话、英语及民族语言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最后, 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参与者会依据语言熟练程度、交际对象、语用需求和具体互动环境灵活选择和调动不同语言资源, 共同语言通常成为跨语言背景交流的重要基础。

上述发现进一步表明,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多语观念具有明显的语境性、动态性和关系性。学习者并不是孤立地评价某一种语言, 而是在长期语言社会化过程中, 根据不同语言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交往中的具体功能形成相应认识。因此, 多语能力不宜被理解为多个彼此独立的单语能力的简单叠加, 而应被视为学习者根据具体交际需求协调和调动其语言资源的综合能力。从超语视角来看, 参与者在不同情境中对民族语言、普通话和英语的灵活使用表明, 不同语言资源并非始终相互分离, 而是共同构成学习者可供调动的语言资源库。同时, 本研究也提示, 多语资源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学习优势。积极的多语观念可以与语言焦虑、能力不均衡和学习压力同时存在, 而语言资源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还受到教育环境、教学方式和实际语言使用机会等因素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从学习者实际语言经历出发, 为理解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多语观念及其语言实践提供了个案层面的经验补充。

在教育实践方面, 既有研究指出, 随着跨文化交流和社会语言需求的发展, 单一外语能力已难以充分满足多样化语言交际的需要[26]。结合本研究结果, 高校语言教育首先应关注不同语言背景学生在普通话和英语学习过程中面临的具体困难, 并根据其既有语言经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学术语言支持。对于普通话学习, 可适当加强学术口头表达、课堂互动、专业词汇和学术写作等方面的支持; 对于英语学习, 则可在保证目标语学习目标的基础上, 允许学生策略性地调动已有语言资源, 通过语言比较、术语解释、跨文化任务和合作学习等方式促进理解和表达。与此同时, 高校多语教育不应仅关注普通话和英语, 还应为民族语言保留适当的使用和展示空间, 使学生能够在校园活动、文化交流及其他真实交际情境中继续使用已有语言资源。教师、学校、学生和家庭之间形成更加协调的语言教育环境, 也有助于减少不同语言学习经历所造成的额外负担, 并提高多语资源在实际学习和交际中的利用效率。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 本研究仅选取三名不同民族背景的大学生作为参与者, 样本规模较小, 因此研究结果主要反映三个具体个案的语言经历, 不宜直接推广至所有中国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其次, 本研究主要依赖半结构化访谈, 研究结果建立在参与者自我报告及研究者解释的基础上, 可能受到个体记忆和主观理解的影响。再次, 研究者并不掌握参与者所使用的全部民族语言,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部分语言实践及其文化语境的深入理解。未来研究可扩大参与者数量和民族背景范围, 并结合课堂观察、语言使用日记、自然交际记录或纵向访谈等多种数据来源, 对学习者的实际语言实践进行交

叉验证。同时, 也可进一步考察多语观念如何随教育阶段和语言环境变化而发生调整, 以及学习者所表达的多语观念如何具体转化为不同场景中的语言选择与超语实践, 从而进一步深化对高校多语学习者语言经验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Cenoz, J. (2013) Defining Multilingualism.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3**, 3-18.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1300007x>
- [2] Saville-Troike, M. (2012) *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88830>
- [3] Cenoz, J. and Gorter, D. (2019) Multilingualism, Translanguaging,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n SLA.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03**, 130-135. <https://doi.org/10.1111/modl.12529>
- [4] Cui, Y. (2022) Multilingualism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a Uyghur Female Yout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2**, 34-39.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22000010>
- [5] Liu, J. and Edwards, V. (2017) Tr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a University Programme for Minor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14**, 38-52. <https://doi.org/10.1080/14790718.2017.1258983>
- [6] Dagenais, D. (2013) Multilingualism in Canada: Policy and Education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3**, 286-301.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13000056>
- [7] Maican, M.A. (2020) European Language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Compet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Series V—Economic Sciences*, **12**, 127-132. <https://doi.org/10.31926/but.es.2019.12.61.2.16>
- [8] 周庆生. 中国“主体多样”语言政策的发展[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2): 32-44+4.
- [9] García, O. and Lin, A.M.Y. (2017)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3rd Edition,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02258-1>
- [10] 李崑, 沈骑. 超语实践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 44(4): 2-14.
- [11] Zhang, R. and Chan, B.H. (2022) Pedagogical Translanguaging in a Trilingual Context: The Case of Two EFL Classrooms in a Xinjia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5**, 2805-2816. <https://doi.org/10.1080/13670050.2021.1978383>
- [12] Lasagabaster, D. and García, O. (2014) Translanguaging: Towards a Dynamic Model of Bilingualism at School/Translanguaging: Hacia Un Modelo Dinámico De Bilingüismo En La Escuela. *Cultura y Educación*, **26**, 557-572. <https://doi.org/10.1080/11356405.2014.973671>
- [13] Gartziaarena, M. and Villabona, N. (2022) Teachers' Beliefs on Multilingualism in the Basque Country: Basque at the Core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System*, **105**, Article ID: 102749.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2.102749>
- [14] 郭奕含. “双共同体”视角下剑川县白族多语教育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15] 高航. 延边州初中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与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延吉: 延边大学, 2022.
- [16] 崔雪波. 新时期我国朝鲜族三语教育政策及教育现状研究[J].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 2015, 3(3): 64-67.
- [17] Heigham, J. and Croker, R.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Springer.
- [18] Ary, D., Jacobs, L.C., Sorensen, C.K. and Walker, D.A. (2014)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ducation*. 9th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 [19] 张贞爱. 朝汉双语人与英语教育[J]. 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1): 155-158.
- [20] 王娟. 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6(4): 170-176.
- [21] Galante, A. (2020) Pedagogical Translanguaging in a Multilingual English Program in Canada: Student and Teacher Perspectives of Challenges. *System*, **92**, Article ID: 102274.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0.102274>
- [22] 戴庆厦.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2): 1-6.
- [23] 沈骑, 陈智平. 超语实践视域下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 问题与路径[J]. 外语界, 2024(1): 14-22.
- [24] 徐锦芬.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动态与前沿分析[J]. 现代外语, 2021, 44(4): 448-455.
- [25] 徐锦芬, 潘晨茜. 多语言意识下的中国特色外语教育规划[J]. 外语教学, 2021, 42(2): 49-54.
- [26] 徐锦芬, 杨嘉琪. 国外多语教育及其对我国多语种人才培养的启示[J]. 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 2022(1): 1-10, 121.